

《有鹿来》新版后记(上)

□苏枕书

2014年6月18日夜里,我在当时赁居的院子外遇到一头健壮的雄鹿。彼此对视后都吓了一跳,鹿转身腾跳着大步离开,惊起一片犬吠。次日我在日记里说:“决定写一本书,叫《有鹿来》,讲京都生活。”这是本书的源头。

当时我硕士课程即将毕业,忙于写论文,对学院的一切尚怀着憧憬,上不完的课,读不尽的书。那年秋天,友人周雯从北京来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访学,我们一起逛书店,吃好吃的,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半年。转年二月,得知顺利通过博士班升学审核后,心情大为轻松,遂开始写作本书。而友人访学期满,那年初春离开了京都。春天的京都很美,而我最爱梅雨时节——真想与她一起经历。因而写作本书之际,也有意识地要与她分享我们都喜爱的古都。当时赴日旅游的浪潮兴起不久,很多旅行杂志都热衷刊登与京都有关的文章。我常给《悦食》《私家地理》《知日》等杂志供稿,写了不少轻快的短文。这种轻快的情绪,同样反映到书稿中。快乐地旅行,快乐地买买买吧,正是那样的时代。

日记里记录了书稿的诞生过程:

2015年3月17日:撰写《有鹿来——京都景物略》。

3月18日:散步吉田山、金戒光明寺,探访墓地。大雨温润,恍如初夏,撰写《有鹿来》。

3月19日:继续《有鹿来》。黄昏出门散步,在家附近的八神社默祷诸事顺利。黑暗里开着瑞香与十大功劳,极清冽。

4月15日:《有鹿来》近尾声。

4月20日:夜里写完《有鹿来》后记,大雨。

6月2日:下午四点半去平安神宫看薪能。深夜交《有鹿来》定稿并画稿。

10月29日:校完《有鹿来》排版稿。夜里圆月硕大,横云飞渡。

书稿交给了老朋友罗毅先生。我们认识得很早,他从《万象》杂志时代开始向我约稿,我交给他的第一部书稿是《燕巢与花事》,不久又在他的建议下翻译了井上靖的《浪人》(原名《战国无赖》)。他极力建议我专写一册关于京都的书,那时他调到中国国家地理出版社工作,对《有鹿来》的题材非常感兴趣。书稿完成得很顺利,2015年8月,我回北京时,与从周在和平里北街同罗先生相聚。暑气闷蒸,林下开满玉簪花。那时《京都古书店风景》刚上市,同时还出了两本译稿,大家觉得京都有许多值得写的题目,热烈地聊了许多。

具体负责稿件编辑工作的是罗先生的同事董佳佳小姐。2016年1月,《有鹿来》上市,副题改为《京都的日常》。那年初春假期,我与从周来到阔别已久的重庆,参加出版社安排的活动。次日又往成都,活动之外,还在武侯祠看了比故乡更早开放的玉兰与海棠。这样因工作而有的畅游此前没有过,此后因为杂事丛脞、假期短暂,亦未有机会经历。因而关于《有鹿来》的记忆,总与快活的旅途有关。

544

有两种辨伪,一种是针对载体的真伪(最典型的是书画鉴定),一种是针对内容的真伪(最著名的应数《古史辨》)。比如,一本书本身(作者及写作年代)的真伪,就属于载体的真伪,一本书所述事实的真伪,就属于内容的真伪。

从商业立场,载体辨伪是至关重要的,因为这决定了载体作为文化产品的独一性或稀有性;但从学术立场,则内容辨伪才是最重要的,因为这决定了内容作为历史记录的可可靠性。简单说,载体的真实与否,其意义更在于文物性,而内容的真实与否,其意义更在于历史性。



有鹿来:京都岁月
苏枕书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为作者游学京都十余年的随笔散文集,亦是一部京都客居笔记。作者游走于校园内的京都和校园外的京都之间,以清丽淡雅的文字描写着京都的日常:古本屋、旧书市、居酒屋、庭园、寺社、美食、秋天的红叶、冬天的白雪、清池的锦鲤、鸭川沿岸永恒又稍纵即逝的风景……这一切无不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下呈现出别样的美感。

只是一首歌: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
[美]宇文所安著 麦慧君、杜斐然、刘晨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聚焦并追踪北宋时期,词如何从宴饮助兴的表演文本——歌词,历经创作、传唱、抄写、结集诸过程,最终衍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,并逐渐取得与诗歌并举的正统地位。作者一方面从表演实践、文本传播、作者问题、词集编纂与流变等全新角度将词史看成“词集史”而非“词人史”;另一方面又对代表性词人如柳永、

相对来说,载体辨伪的难度更大,更不易产生定论,但其学术意义却是有限的。经常有这样的情形:载体虽伪而内容不伪(比如书画的摹品或赝品),作为史料,其传达的历史信息未必减少,或者载体虽伪而内容精彩,作为艺术,其审美价值未必降低。这样的话,真迹与否,果真有那么大的意义吗?

我不是要否定真迹的价值,我只想强调,不必过于迷信真迹的价值,不必陷于绝对的真迹崇拜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,只有一件真品,而且似已不存于世了,可如今那么多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不也是无价之宝吗?王羲之《兰亭序》,根本

相对来说,载体辨伪的难度更大,更不易产生定论,但其学术意义却是有限的。经常有这样的情形:载体虽伪而内容不伪(比如书画的摹品或赝品),作为史料,其传达的历史信息未必减少,或者载体虽伪而内容精彩,作为艺术,其审美价值未必降低。这样的话,真迹与否,果真有那么大的意义吗?

我不是要否定真迹的价值,我只想强调,不必过于迷信真迹的价值,不必陷于绝对的真迹崇拜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,只有一件真品,而且似已不存于世了,可如今那么多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不也是无价之宝吗?王羲之《兰亭序》,根本

晏几道、苏轼、秦观、贺铸、周邦彦、李清照等人的作品进行文本解读,分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影响,力图从多个层面呈现词的历时性发展及其作者化、风格化和经典化的过程。

赤壁之戟:建安与三国
田晓菲著 张元昕译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“三国”与“建安”经历了一个从历史走向文学,从史实走向浪漫化的过程,这是一场迷人而又影响深远的建构。作者跨越了诗词、小说、电影、电视等雅俗载体,勾勒出“三国想象”的变迁史。

书籍秘史
[西班牙]伊莲内·巴列霍著 李静译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书籍的诞生及变迁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。本书将带你展开一趟穿越书的生命旅程。从尼罗河畔的莎草纸到亚历山大港的伟大图书馆,从游吟诗人的荷马史诗到苏格拉底对书面文字的批判,从学习抄写的贵族子弟到替人朗读的奴隶,你将领略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各种关于书的迷人故事。

反读书记(一九八)

□胡文辉

早就不存在真迹了,但即便是“下真迹一等”的摹本、摹本的摹本,甚至摹本的拓本、拓本的翻拓本,也是价值连城的呢——作为前机械复制时代的复制技术,作为“中国特色”的艺术品,拓本最有力地破除了真迹价值的绝对性。(拓本异于近代复制技术之处,要点不在于手工技术,更在于它是一种有限复制,而非机械式的无限复制。拓本虽只是对石刻的复制——石刻已非真迹,也只是对真迹之再复制,但它亦有类似于艺术品的稀缺性,尤其当石刻原迹不复存在的情形下,其文化价值更是与原迹无异了。)

无锡钱氏家风的现代启示(十二)

□钱之俊

家长的榜样作用在优良家风的形成上不可忽视。以钱基博为例,他在绳武堂树立了绝对的家长威严,也是绝对的读书权威——他自身的学识和品行给孩子们塑造了一个做人与为学的典范。他一生勤奋读书,勤勉治学,淡泊名利,甘于清贫,不以做官求富贵为要,堂堂正正做人,对子侄辈在读书求学上产生了润物无声的影响。

钱基博《自传》言:“自谓集部之学,海内罕对。子部钩稽,亦多匡发。”“生平无营求,淡嗜欲而勤于所职;暇则读书,虽寝食不辍,怠以枕,餐以饴,讲评孜孜,以摩诸生,穷年累月,不肯自暇逸。”近年出版的一套皇皇《钱基博集》,就可见其读书治学之勤。生活上,钱基博极其自律,对己要求几近苛刻。《自我检讨书》言:“‘吃’‘喝’‘嫖’‘赌’四字,我不犯一字,连纸烟都不吸。”“我不愿积了钱,供一家享用奢侈,我宁可送给人家用,我不愿送人家的礼物。”《自传》说:“性畏与人接,寡交游,不赴集会,不与宴饮;有知名造访者,亦不答谢;曰:‘我无暇也。’”“基博则卑之,不敢高论,只以‘不吸烟’‘不赌博’‘不狎妓’‘不纳妾’四事自约敕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钱基博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。1952年,又把收藏的甲骨、铜玉、陶瓷、历代货币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。从1953年开始,他身体转差,说话已有困难,不再去教室上课,基本上是独自读书、治学,也帮助指导青年教师。章开沅回忆,钱基博“对学校与历史系的教学、科研与师资培养仍然非常关心,常常给校、系领导提供恳挚而又有益的建议,对于青年教师的请益问难,他也是循循善诱,热情给以指点。”据最后一批被指导的青年教师回忆,从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,钱基博为系里的青年教师扎扎实实讲授了一年的中国古代史课,“认真备课,一丝不苟,负责到底,有始有终”。

而钱基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,应该是造就了同样淡泊名利的一代鸿儒钱锺书。对知识的追求让钱家几代人都活得简单而卓越,一个家庭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会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。钱氏家族的醇正家风,是钱氏家族宝贵的“不动产”,也是他们留给中华文化的“种子”。